

红色旅游·百年记忆

有一首乐曲，你不一定知道它的名字，但一定熟悉它的旋律。除夕夜，当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传来它明快的节奏、流畅的音调时，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开始了。它的名字就是《春节序曲》。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春节序曲》，自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人心中“喜庆、团圆”的符号。

灵感

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

1954年，作曲家李焕之走在温暖的春风里，感受着新中国的勃勃生机。刹那间，他的思绪回到了1943年延安的新秧歌运动，在同样明媚春光里，军民一起舞起了欢快的秧歌。李焕之的创作欲望突然被点燃了，他决定要写一部真正有浓郁民族味的管弦乐作品。窑洞、窗花、纺车、秧歌……延安的一切此时都成了《春节序曲》的灵感来源。

李焕之在《我的六十年作曲生涯》中写道：“1954年我动手写作一部管弦乐组曲《春节》，先把《序曲——大秧歌》谱写出来，就交给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试奏……”

谈到秧歌和新秧歌运动，就不得不提到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今日的延安，仍然可以寻访到那次座谈会的影子。

陕西省延安市杨家岭革命旧址，平整的院落里，大树环绕，阳光用金线给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勾画了一个鲜亮的轮廓，使这座石砌小楼，显得格外耀眼。

“因俯瞰形似飞机，所以中央办公厅楼也称飞机楼。”延安市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党婕睿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年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中央办公厅楼于1941年建成。共分为3层：一楼西厅是中央机关的餐厅，东厅是作战研究室，后来改为中央图书室；二楼是办公室兼政治研究室；三楼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室。

1942年5月2日至23日，100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这里的长条板凳上，举行了3次大会和多次小组讨论会，探讨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各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其中新秧歌运动尤其引人注目。

鲁艺

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

新秧歌运动最先从小场子秧歌开始，产生了《南泥湾》《拥军花鼓》这样广为人知的作品。

李焕之创作《春节序曲》的第二乐章时，也是想起了当年看到的一段小场秧歌调。婉转的旋律、优美的舞步，十几年过去了，那段音乐依然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最终被他写进了《春节序曲》充满柔情的第二乐章中。而这一部分，后来又成为中央电视台在每年除夕节目《一年又一年》的背景音乐。

说到延安时期的文艺繁荣，就不得不提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时的李焕之正是鲁艺的一名讲师。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

“这座建筑位于延安城东北5公里，中西文化交融，建筑既借鉴了古罗马哥特式风格，又吸收了字匾、楹联以及梅花、牡丹等中国元素。”延安鲁艺文化园区讲解员刘博说。

为响应毛泽东同志“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的号召，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

1943年春节，鲁艺组成150余人的秧歌队走上延安街头，从此，秧歌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大秧歌队以镰刀、斧头领头，人物形象全是工、农、兵、机关干部、学生、少年儿童等，丑化的人物形象消失了。”刘博说。



秧歌队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演出了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以及《腰鼓》《旱船》等，足迹遍布延安城内外。自此次春节秧歌盛会后，每年的元旦、春节以及重大宣传集会活动都要扭起火热的秧歌来。

传承

经久不衰的炽热舞步

热情的秧歌舞步一直跳到今天。

在延安，欢快喜庆的陕北秧歌寄托着延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每逢喜庆日子，丰收年景，招待客人，人们就会扭起秧歌。

近几年，延安每年春节都要组织秧歌汇演，在双拥大道1200米长的表演场地里，一队队秧歌飞红荡绿，一辆辆彩车流光溢彩，秧歌队在伞头的带领下不断变换队形，队员们时散时聚，扭到高潮时还和着锣鼓的节拍发出“嗨、嗨”的喊声。

昔日的鲁迅艺术学院旧址，也变成了崭新的鲁艺文化园区。“目前园区由一个核心区即‘六届六中全会旧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以及延安文艺纪念馆、东山革命文艺家个人馆区、西山艺术家实践体验区等7个部分组成。”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介绍。

“这些文物是在延安诞生的，让它回到‘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们多年的愿望。”2020年10月16日，李焕之之子李大康将父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手稿、生活用品等珍贵文物郑重交到鲁艺文化园区工作人员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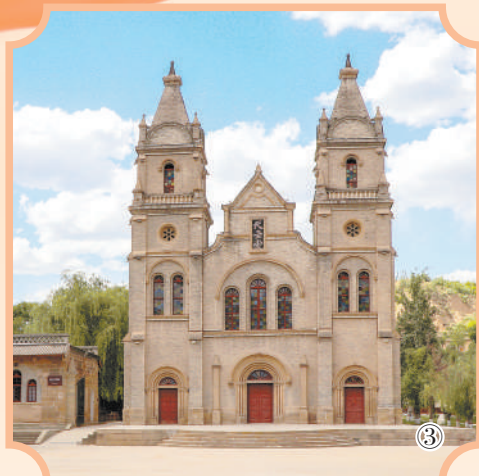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在延安鲁艺文化园区东山的一个院落，昂扬奋进的旋律从窑洞里飘了出来。这里是位于园区东侧的革命文艺家博物馆群。一排排整齐的窑洞，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每一间窑洞便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人博物馆。这里已建成茅盾、丁玲、沙可夫、洗星海、贺敬之等20位革命文



窑洞、纺车、秧歌激发灵感

春节序曲奏响欢乐

本报记者 张丹华 本报通讯员 李江峰



艺家个体馆，继续承载着炽热的红色革命文化，成为延安红色文化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①：延安东山革命文艺家博物馆群。图②：延安安塞区冯家营，村民们表演腰鼓秧歌。图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图④：革命圣地延安。

图①为资料图片，图②为本报记者张丹华摄，图③图④为刘阳摄。



博物馆里的牛



唐代《五牛图》卷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本图无作者款印，本幅及尾纸上有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

《五牛图》(图⑤为《五牛图》局部)为唐代韩滉(huàng)作，纸本，设色，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

图画五牛，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画成正面，视角独特，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作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牛的骨骼转折，筋肉缠裹，笔法老练流畅，线条富有力度。牛头部与口鼻处的根根细毛，更是笔笔入微。每头牛皆目光炯炯，作者通过对眼神的着力刻画，将牛既温驯又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极为传神。作品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无背景衬托，造型准确生动，设色清淡古朴，浓淡渲染有别，画面层次丰富，达到了形神兼备之境界。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韩滉任职宰相期间，注重农业发展，此图可能含有鼓励农耕的意义。《五牛图》是其作品的传世孤本，也是寥寥几件唐代纸绢绘画真迹之一，因此不论其艺术成就还是历史价值都备受世人关注。



徐悲鸿设色 芳草黄牛图轴

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图⑥)。纸本。全纵273厘米，全横60厘米。图中画一黄牛正在吃青草。右下题七言二句：“芳草得来且自饱，更须何计觅平生。”旁款：“壬午春日方先生正之，悲鸿客保山。”该作品全图笔法类似写生，简单灵活，活灵活现。



清代石湾窑牛式花插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花插(图⑦)长19.5厘米，高11厘米，作牛式造型，胎体厚重，造型新颖。花口内饰黄釉，其余处满施深蓝釉，釉层凝厚，深蓝色釉中渗化出葱白色雨点状花斑，牛首及腿又呈现出窑变的效果。其窑变以蓝色为基调，虽仿钧窑，却又大不相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石湾窑位于广东佛山市石湾镇，产品仿钧窑釉色，故又被称为“广钧”。石湾窑以陶塑和建筑陶瓷著称。此件花插将牛雕塑得憨态可掬，釉色以蓝色为基调，变化万千。为石湾窑的代表作品之一。



清代碧玉圆雕卧牛

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卧牛(图⑧)头部高8厘米，身长22厘米，腹宽8厘米。此摆件呈卧牛状，由整块碧玉圆雕而成。牛首微抬，牛角粗壮而内弯，角上饰有凸凹起伏状棱，牛耳下垂，双眼圆睁，牛嘴紧闭。卧牛四肢收于腹下，尾部以阴刻线雕出尾梢牛毛。卧牛整体设计比例协调，抛光电圆润，尾部雕刻灵动，展现出南方水牛悠闲自得的样子。

清代圆雕动物造型较明代更加真实，身体各部位比例准确适度。各种动物雕像，品种丰富，形态各异，动作逼真。“牛”音近“扭”，有扭转乾坤之意。此器可作镇纸、文玩和陈设品。(本报记者王珏、刘洪超整理)

身边的年味

“过年吃粽子，我们祖祖辈辈都这样。”

黄桂珍刚下车便换上头巾，同婶婶赶往菜园割上好的香粽叶，今天，她们要包够一大家十几口人吃的粽子。黄桂珍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她每年都会专程回村包粽。在横县，年糕也叫妈妈粽，当地至今流传“无粽不成年”的俗语。在当地人眼里，大粽总是跟“喜悦”联系在一起。大粽不仅是年夜饭中替代米饭的特制主食，也是婚嫁乔迁等情境下表达喜悦的必备美味。

腌肉、泡糯米、泡绿豆、去豆壳……包粽前一两天做好准备工作。蒲扇般大的香粽叶煮洗后韧性变强，却保留了绿油油的外观。一层糯米，一层绿豆，一块腌制的五花肉，再加一层糯米，压实成金字塔状，最后用粽叶包裹，以蕉秆皮收拢造型，以红绳层层缠绕，一只粽子就这样诞生了。

煮熟的大粽吃不完便悬挂起来，冬日可储存半月。待到除夕，大粽由家中长辈分发，众人分食。雪白剔透的

腊月八桂粽飘香

本报记者 祝佳祺

糯米包裹着嫩黄色的绿豆仁、煮透的五花肉。油脂浸入糯米，香味四溢，搭配满桌的菜肴，这就是横县世代相传的“年味记忆”。据《横县志》记载，从正月初二起，人们杀鸡祭祖，吃粽子，开始到亲友家拜年。新婚夫妇回门拜年，也要送去鸡、肉、酒、大粽等年货。如今横县大粽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广西，横县并非唯一保留年糕习俗的地区，但不同地区的年糕形态、大小不一，有方形，有三角形；有大粽，也有小粽。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原副院长吴国富介绍，广西年糕习俗的成因与其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有关。据《广西通志》记载，旧时人们以大米、玉米为主食，糯米种植较少，一些节日要专做糯米食品来庆祝。除了粽子，



图⑨：黄桂珍在制作横县大粽。图⑩：新包好的横县大粽。本报记者 祝佳祺摄